

民国时期的服装研究

黄敏*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江苏 苏州 215021)

摘要:中国古代服饰一直以宽衣博袖著称于世,辛亥革命后服装为之一变。西服、中山装、学生装、旗袍、西式时装等近代服装占据着半壁江山,传统的长袍马褂也未退出历史舞台。民国时期的服装表现出明显的多元性特征:一方面形成了以中山装和旗袍为代表的“国服”,另一方面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政治派别、不同地域的服装存在很大的差异,服饰“辨等次,昭名分”的功能在相当范围内还存在。

关键词:民国服装;西服;中山装;旗袍

中图分类号:K258;J523.5;TS94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432(2005)04-0012-03

Costumes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HUANG Min

(College of Sociology,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215021, China)

Abstract: Ancient Chinese clothes used to have big sleeves. Things changed after the Revolution of 1911. A plurality was shown in the coexistence of Western-style clothes, student dress, traditional long gown and mandarin jacket, and national costumes, Chinese tunic suit and cheongsam. There were grea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lothes of different social classes, political sects and regions. At that time, a person's dress still revealed his or her social status.

Key words: the Republic of China; costumes; Western-style clothes; Chinese tunic suit; cheongsam

衣,在衣食住行中居首位,与人形影相随已有上万年的历史。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中华服饰也为一变。这一变不仅取决于朝代的更迭,也是受西方文化冲击的结果。

一 民国时期的服饰

(一)官方礼服制度。中华民国的成立,要求从外表上与清王朝脱离关系,服饰文化的改变就是这一要求的外在表现。中华民国在服饰上的“新”表现在正式服饰上,就是废除满式的官服顶带,表现在常服上则是不再将传统服饰作为唯一的选择。

辛亥革命后,国民政府成立,参议院于民国元年七月公布了《服制条例》,规定男女礼服制度。女子礼服基本上为清代汉族女装的发展;男子礼服则分中、西式。中式为传统的长袍马褂,西式礼服分大礼服和常礼服两种,大礼

服又有昼夜之分。昼礼服长与膝齐,袖与手脉齐,前对襟,后下端开叉,黑色,穿黑色过踝的靴;晚礼服类似西式燕尾服,穿短靴,前缀黑结。穿大礼服戴高而平顶的有檐帽子。常礼服与大礼服大同小异,惟戴较底的有檐圆顶帽。时人解释这种中西并存的礼服制度:“竟用西式,于习惯上一时尚未易通行,……故定新式礼服外,旧式褂袍亦得暂时适用。”^[2]

中华民国对平时便服,不作具体规定,人们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选择服饰,无论款式、颜色都不受限制。

(二)男子常服。民国流行的男子常服主要为长袍马褂、西装、中山装等,纯中式的大襟袄、中式裤、黑布鞋亦存在于广大的农村。这种差异一方面是由经济水平以及社交范围不同而形成,另一方面也是因职业、年龄、职务、修

* 收稿日期:2004-12-20

作者简介:黄敏(1981-),女,江苏如皋人,苏州大学社会学院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生。E-mail:m-huang123@126.com

养等的不同而出现的。

1、西装。在西风东渐和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下，西装早已为中国人熟知。最初，西装绝大多数是进口，1904年在上海“王兴昌记”诞生了中国人缝制的第一套西装。20—30年代，大都市出现了专门制售西装的公司，还创下了中国人自己的名牌。报纸、杂志也开辟专栏、介绍西式服装。西装从开始的星星点点，到与中装平分秋色并大有后来者居上之势。清末民初许多政坛要人如章宗祥、陆徽祥、周自齐、朱启玲、曹汝霖都着起了西装，穿上了皮鞋，提起了手杖，在北京中央公园游园。^[3]《近代名人图鉴》收录的唐绍仪内阁全体10人合影中，有7个人穿的是西装。此外，基本上所有的民国军政要人，甚至包括像溥仪、载恬等满清贵族都有西装照留世。

西装的流行究其原因有二：一是传统礼教彻底崩溃，人们不再顾及所谓“服色正朔”；二是对西洋文化的崇尚，爱屋及乌。正如郁达夫所云：“大家都知道了西洋文化的好处，中国人非学他们不可了，于是乎，阿狗阿猫，就都着起了西装，穿上了皮靴，提起了手杖，以为这就是西洋文化的一切。”^[4]林语堂也说：“西装之所以成为一时之风气，为摩登女士所乐从者，唯一的理由是，一般人士震于西洋文物之名。而好为之效‘颦’。”^[5]所以在中华民国成立后，西装迅速成为中国上层社会的正式社交服装。

2、中山装。西装无论从名称上还是样式上都是纯粹洋人的玩意儿，并不完全适应中国人的生活特点，于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山装出现了。孙中山先生亲自创导的中山装是在“学生装”和“企领文装”的基础上改革而成的一种服装。最早的中山装作封闭式八字形领口，装袖，前门襟上有九粒纽扣，后背有中缝，腰际有阔带式横襟，衣服的上下左右各缀有一贴袋，上端加有戴盖，下面的袋子裁制成可以随放进物品多少而涨缩的“琴袋”式样。中山装的款式后来在领子、袋盖、纽扣及袖口等部分都有变化，制作工艺和色彩等方面都有所改进。

由于敬仰孙中山先生的政治威望，政府官员、文化人士等纷纷效仿，一时成为民国时期的风尚，中山装成为民国时期三大男装款式之一。1945年国共两党重庆谈判时，毛泽东与蒋介石都着中山装，可见中山装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中山装与欧美及东亚各国西服的最明显区别在于他的立领是关闭式的，从而具有了中国民族含蓄内敛的特色。直到今天，中山装仍然作为代表中华民族气魄的一种服装，流行在人民的生活中。

3、长袍马褂。虽然经过了以西装为代表的新式服装的冲击，传统的长袍马褂仍然占据着半壁江山。褂是清代特有的一种礼服，穿时加罩于袍服之外。马褂之制于康熙末年在全国普及，成为一种常服。长衫的形式在民国初年定型后就再也没有多大的变化，作大襟右衽式，长及脚踝上2寸，袖长与马褂并齐，在左右两侧下摆处，开有1尺左右长衩。

民国仍然将长袍马褂作为国家礼服的一种，但是在穿

着上抛弃了等级差别。故而革命者取其义，守旧者取其名，使长袍马褂在近代中国服饰舞台上仍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长袍马褂的忠实拥护者——中老年人以及守旧人士们，依然试图引导下一辈维护传统，最起码己身严守陈规穿着长袍马褂，却不知近代的服饰改革早就在青年和中老年之间划出了一条代沟。众多的青年，由于文化和知识水准的不断提高，眼界的不断开阔，纷纷跨过老一辈设下的界限，置传统与忠告于不顾，普遍追求新式服装，男穿西服女着裙装已是常见之事。

(三)民国流行的妇女服饰。民国时期的妇女服饰在西化速度方面落后于男性，但就款式以及更新速度而言则比男性服饰丰富。从古至今，妇女的服饰就比男子要复杂得多、也发达得多。这一时期女子服饰的突出代表就是新式旗袍和时装的出现。

1、旗袍。到20年代后，由于受欧美服装的影响，旗袍衣身缩短，腰身紧收并缀以肩缝，较以前变得妩媚精致，更加舒适合体，衬托出女性美。在机械工业逐渐兴起的形势下，去掉长衣大袖而使之轻便适体，无疑是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30年代后，旗袍进入其全盛期，不断创新变化，时高领时低领，时长袖时短袖时无袖，时盖过脚面时短及膝盖……总体而言，旗袍得衣领紧扣，曲线鲜明，加以斜襟的韵律，突出了东方女性端庄、典雅、沉静、含蓄之美。正是旗袍不断自我更新的特性使其永葆魅力，成为一种具有独特风貌的服装，享有“国服”之誉。“中国人都将旗袍看成女性国服，老派人接纳它是因为它有个完全中国味道的名字，中国传统袍服的表征和含蓄美好的意趣，而西式制作和时尚因素的融入又迎合了必需的开放和开明；新派人士欢迎它是着眼于其连衣裙的本质所带来的中西交融的衣着空间，以及与西式服饰类似的时尚感。”^[6]

2、时装。除旗袍外，女性服饰繁荣的显著标志之一就是时装的出现。在某一时期内通行的新式服装被称为时装，时装在上海的广泛流行使上海成为全国的服装中心。商家的服装展演、女演员的穿着都引领着时装的潮流。时装中的裙装成为都市女性的新宠，样式、颜色时时翻新，举不胜举，或无袖或荷叶袖，或‘V’字领或‘—’字领，或长及没裸或短及膝上。披风、西式大衣、西式外套、毛线马甲、泳衣、各款帽子、围巾……共同构成时尚女装的一部分。有的在西式大衣或外套里面着一袭旗袍，则兼具妩媚与端庄的风韵。辛亥革命后，受留日学生的影响，上衣下裙一度是最流行的服装。一般这样的穿着以修长的高领衫袄配黑色素长裙，弃首饰不戴，又称“文明新装”。《妇女杂志》第九卷第一号所刊民国十二年时上海妇女运动的照片中，大部分是上衣下裙，数十人中只有一人穿旗袍，还较为宽博。

二 民国服饰的特性

(一)城乡之别。以上涉及的各式服装都是在城市、商埠、城镇广泛流行的，所适应的人群也以学生、商人、政府官员等上层人士为主。在广大的农村，这些服饰鲜见于

市,穿着者更为少见。农村劳动人民的穿着变化不大,仍为传统的大襟袄、中式裤、白布袜、黑布鞋。衣服的材料也不如城里变化多样,色彩丰富。他们所穿的衣服从纺纱、织布、染色到剪裁都是在家庭里手工完成的。所以布料粗糙,款式简单,色彩单一。“当上海女子已经开始整烫头发,足着高跟鞋时,河北三河县妇女头上还戴着三四百年前的冠子,足下还缠着一双‘三寸金莲’;当北平的贵族妇女已经着贴身旗袍之时,在甘肃还有三十年前上海时兴过的大镶滚袖衣。”^[7]

农村与城市之间在服饰方面的差异大致有如下三个原因。其一,城市与外界的交往远比农村频繁,因此无论是服装的款式还是材料变化都比农村要快很多。其二,在农村,传统封建思想的禁锢远比大都市来得严重,闭塞落后的农民依然固守着视服饰过分艳丽、新奇为妖气、淫荡的社会心理。这种社会心理形成的社会氛围给新式服装的推广设置了重重障碍。其三,农村生活极为拮据,尤其在穷乡僻壤之地,养家糊口、暖衣饱食已是奢求,自然没有追求新潮的经济实力以及心思,所谓“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是农民服装的真实写照。所以中国普通民众的服饰比起上层社会而言是单调而缺少变化的。

(二)阶层之分。如果说城乡之间的服饰差别是经济上和社会心理上的原因造成的,那么,上下层社会之间服饰的差异就是传统等级制度残存的表现。中华民国在法令上废除了沿循数千年之久的服饰等级制度,但在社会心理上这种等级制度依然根深蒂固。从鲁迅先生所著的《孔乙己》一文中可以清楚的看见,以长衫和短褂为标志的两个楚汉分明的等级,前者可以坐着喝酒吃菜,而后者只能站着喝酒。在长期的民俗文化心理的堆积中,中国人在森严的等级制度下形成了高度自觉的服饰角色心态,按照自己所属社会阶层穿着特定的等级服饰,在穿衣上着重体现“我们这一群”的心理特征,从而导致了服饰上的雷同现象非常突出。人们,尤其是中上级人士习惯于通过服饰的款式、质地来区分不同的职业和阶层。中国的服饰也就成了一张穿在身上的名片。除此以外还讲究相应的仪容举止,否则就是“穿上龙袍也不象太子”。于是在上下层社会之间形成了一个明显的隔阂,下层人民即使能负担得起上层人士的服装也不会逾矩,这不仅仅是因为上层的歧视,也是下层的自觉。

(三)派别之辨。民国时期服饰穿着的不同显示出不同的政治派别。仅就男装而言,根据《中国近现代名人图鉴》收录的33个革命党人的照片统计,穿西服者有16人,穿中山装(包括企领工装)者6人,穿军装者2人,穿和服者2人,穿长袍马褂者7人。该书收录的清政府各地督抚无一例外都穿着官服或长袍马褂式的常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辛亥革命中的各省都督除2人外都着军装、西服或中山装。可见同一政治派别在服饰上具有趋同性。^[8]清朝官僚试图以固守清朝服饰来表明自己维护旧朝的忠诚,

而革命派也用新式的服装来体现与旧朝一刀两断的决心,尤其在辛亥革命前后,各省起义的督抚更是充分地利用服装来显示自己的革命态度。

(四)民族性之别。有国外的学者认为,旗袍和中山装是强烈的民族主义在近代服饰上的体现,“虽然是西式服装的改变,但是中山装很快就成了中国的‘民族服装’,或者说,在心理上被民族化了。”^[9]笔者认同这种观点。中华民国成立后,尤其在经历了“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之后,全国涌现出前所未有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情绪在服装上的爆发自然是要要求能有一个代表本民族的服装。但是,长期以来,汉族并没有自己合适的民族传统服饰流传下来,于是在急切的要求下只能将某些服饰加以异化来达到目的。中山装由于孙中山先生在全国人民心中的威望而成为了男式“民族服装”,再也没有人去追究中山装的源头实际上是洋人的玩意儿;同样,旗袍被选为女式“民族服装”,同样没有人追究它的源头是满族的民族服饰。

中华民国在服饰上最大的建树是废除了封建的服饰等级制度。从此,人们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和爱好来选择服饰,使中国的服饰文化进入了一个真正繁荣新时代。但是,不能忽视的是,至此中国的服饰开始一再的被西化,传统的服饰几乎消失殆尽,各旅游景点的传统服饰似乎只是为中外游客准备的,而且不适合穿着参加社会活动。这样的现状不得不使人忧虑华夏五千年的文明会不会就在服饰这一载体上失落。显然,要保存中国传统的服饰文化不是仅仅建几个博物馆就能解决的,它要的是创新,在新的时代里重新演绎属于中国人自己的传统服饰。

参考文献:

- [1] 康有为. 戊戌奏稿[A].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十三辑)[Z]. 台北: 云海出版社, 1969.
- [2] 民国政府参议院. 服制条例[N]. 申报, 1912-07-15.
- [3] 胡铭, 秦青. 民国社会风情图(服饰卷)[Z].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0.
- [4] 郁达夫. 郁达夫文集(卷八)[M]. 广州: 花城出版社, 1984.
- [5] 林语堂. 林语堂文集[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5.
- [6] 袁杰英. 服饰的继承与创新[A]. 首届北京国际服装基础理论研讨会文集[C]. 北京: 轻工业出版社, 1990.
- [7] 袁杰英. 中国历代服饰史[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4. 217.
- [8] 熊治祁. 中国近现代名人图鉴[Z].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2.
- [9] 山内智惠美. 20世纪汉族服饰文化研究[M].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01. 29.

(责任编辑: 骆晓会 英文译校: 文爱军)